

# 国际多元化与母公司创新能力研究

## ——基于制度距离的调节效应

王公为<sup>1,2</sup>, 彭纪生<sup>1</sup>

(1. 南京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2.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国际二元性视角,探讨了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制度距离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管制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文化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关键词:**国际多元化;创新能力;制度距离

**DOI:**10.6049/kjbydc.2014030241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4)19-0075-06

##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知识创造过程日益国际化<sup>[1]</sup>。跨国企业被知识驱动,在海外市场寻求和培育知识资产<sup>[2]</sup>。新兴市场企业由于市场和技术知识基础的限制,以国际化为跳板向海外扩张,向地理上分散的单元寻求技术吸收和互动机会。由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大量中国高技术企业通过国际多元化寻求品牌构建和技术更新。

与企业国际多元化实践不同,现有“国际多元化—创新能力”关系研究并未取得一致性结果。一些研究表明国际多元化对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sup>[3]</sup>,另一些研究表明两者是非线性关系<sup>[4]</sup>。分歧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既有研究大多以发达市场为背景,基于传统理论验证国际多元化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忽略了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特征及趋势<sup>[5]</sup>;另一方面既有研究没有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放入“国际多元化—创新能力”关系模型,忽略了企业国际多元化发挥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导致结果不完善<sup>[6]</sup>。

本文在新兴市场背景下,从国际二元性视角,在制度距离约束下,探讨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

## 1 文献回顾

国际多元化是指企业跨越国家边界进入不同地理

区位或者市场的行为<sup>[7]</sup>。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领域的学者对于国际多元化与创新的关系具有浓厚兴趣。既有文献认为,国际多元化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国际多元化使企业接触母国市场不具备的知识库,激发企业搜寻新的商业实践,促进创新。另一部分研究认为,国际多元化与创新能力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在国际化早期阶段,企业能够获得新知识和技术,国际多元化能够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但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创新受到与规模相关的正式化和管理者操控的影响,国际多元化会削弱创新能力<sup>[8]</sup>。

从既有文献来看,存在以下不足:

(1)既有研究多数在发达市场情境下检验国际多元化与创新能力的关系,少有在新兴市场情境下涉及该问题。与传统企业国际化不同,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不是为了向东道国转移所有权优势,而是将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接近海外知识,如先进技术、专利、研发成果等,以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新兴经济体国际化不是国内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替代方式,而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模式,形成组织结构、知识创造和整合方式<sup>[9]</sup>。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体现出二元性特征,包括利用型和探索型。利用型国际扩张鼓励企业积累知识和经验,降低不确定性,提升在海外市场的生存机会;探索型国际扩张寻求竞争优势的创新性形式,增强企业突破性或破坏性变革倾向,克服组织短视,引导企业成

收稿日期:2014-04-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2097)

作者简介:王公为(1981—),男,辽宁凌源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国际化和技术创新;彭纪生(1957—),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长。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特征需要从新视角解释国际多元化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2)既有研究忽略了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中的作用。在国际商务研究中,距离是一个关键要素,国际管理在本质上是对距离的管理。企业国际扩张缩短了母公司与东道国知识库之间的空间距离,但并不会自动清除其它影响跨国知识流动的重要障碍,如制度距离,它对跨国企业在海外的知识寻求和利用影响显著<sup>[10]</sup>。受限于国际市场中的制度距离,新兴市场企业常基于不同认知框架寻求机会和信息。由于缺乏海外市场经验,即使接触到了与产品创新相关的创意和信息,也可能没有发现信息和创意的潜力,从而削弱国际多元化作用。由此可见,对制度距离的忽略会影响企业正确认识国际多元化的作用,从而得出片面结论。

本文在新兴市场背景下,以制度距离为边界条件,探索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全面解释国际多元化、制度距离以及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 2 理论与假设

### 2.1 国际多元化与母公司创新能力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表现出二元性特征,即同时进行利用和开发<sup>[11]</sup>。Chittoor 等在对印度制药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中提出,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在产品 and 市场维度上体现出利用和开发的双重动机。外部环境要求新兴市场企业同时从事渐进式和激进式国际扩张行为,在新兴和成熟市场参与竞争,提升企业绩效<sup>[12]</sup>。

知识利用型国际扩张是企业基于既有内部知识和能力在海外市场获利的国际化行为。随着知识利用范围的扩大,企业面临着更广阔的市场环境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促使企业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方面作出更多承诺,使企业有更大的动机投资于资源构建和发展创新能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知识利用,增强了企业技术投入的需求,引导企业投资研发和更新产品。产品规模的扩大与共享范围的扩展,有利于提升母国企业创新能力。此外,跨国企业、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联结被认为是重要的学习来源。新兴经济体企业在知识利用过程中,能够获得产品设计、技术、质量、成本控制、国外消费者需求和竞争性产品信息,从而更多地了解顾客需求,在本地市场中开发新机会。母公司为了吸收海外子公司的知识转移,并将其与现有知识进行整合,会提升研发投入水平,而研发投入的增加会提升母公司的技术能力<sup>[13]</sup>。如 2009 年,印度塔塔汽车集团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市场,开发出价格为 2 500 美元的新产品 Nano,其海外市场的信息反馈推动了本土企业创新。当新兴经济体企业在海外市场进行知识利用时,技术知识会在跨国公司内广泛传播,其国内研发行为会更为积极,刺激母公司对既有资产的产品和过程

创新。

知识寻求型国际扩张是指以获取东道国智力资源、研发机构、研发信息等为目标,以新建或海外并购为手段,旨在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知识寻求型国际化行为是被东道国拉动形成的,不是利用既有所有权优势,而是通过获取新知识而增加企业特定优势。成功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先通过资产利用在国外建立市场形象,而后快速地进行知识寻求<sup>[14]</sup>。企业国际扩张中的知识寻求扩大了企业知识库规模,在多个市场获得了更大范围的文化视角,使企业能够利用新创意,整合新研究到自身产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国际多元化能够帮助企业生成研发资源,利用不同国家的特殊优势提升创新能力。新兴经济体企业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地理分散的研发单元,利用东道国的科技投入,接触和吸收先进技术和情报,依靠多个国家科研人员的知识和创意,提升本国创新能力。通过与当地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和研究机构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联结,新兴市场企业能够获得知识溢出。该网络联结不仅增加了新兴市场企业与发达市场知识持有人进行信息交换的频率和密度,也使新兴市场企业能够识别和雇佣具有关键技术的雇员,促进当地知识持有人向新兴市场企业进行知识转移。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 2.2 制度距离调节作用

制度距离是指两个国家在制度环境上的相似或者差异程度<sup>[15]</sup>,包含正式和非正式两个方面。正式制度距离体现了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在法律制度和管制之间的差异,类似 Scott 分类中提出的管制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来自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在价值观、信仰、习俗、传统和行为准则上的差异,由于内涵和特征的异质性,大量研究用文化距离代表非正式制度距离<sup>[16]</sup>。

#### 2.2.1 管制距离

管制制度为企业战略选择和利益追求提供了框架,是企业结构和行为的关键因素。管制距离也被称为行政距离或者政治距离,用来描述国家之间在管理、治理体系上的差异,体现在法律、规则和政策等方面<sup>[17]</sup>。国家管制环境差异对组织交易、企业战略导向以及个体心智模式存在显著影响。与发达市场相比,新兴经济体以管制框架的经常性变化、不同层级政府的直接干预和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为特征。如果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在管制环境上差异较大,正确理解不同的管制环境要求就变得非常困难,这使母公司与各东道国运营单元的沟通成本增加,海外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战略资源的难度加大。管制距离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企业识别、分析和解释东道国市场信息的难度。复杂的程序要求会限制新商业行为的采

用<sup>[18]</sup>, 或者阻碍新的业务成为企业的长期战略。管制距离的增加会导致新兴经济体企业对海外市场产生知识缺口, 影响知识获取和转移, 使母公司很难对新知识与既有技术惯例进行协调整合<sup>[19]</sup>, 导致海外子公司知识溢出效应减弱。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当管制距离增加时, 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 2.2.2 文化距离

国家文化包含国民价值观、信念和假定, 对人们解释现实和信息具有塑造作用。文化距离是指两个国家在文化规范上累积的差异<sup>[20]</sup>, 是由于语言、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规范等方面差异导致的。文化距离使母公司缺乏对海外子公司当地文化和商业实践的理解, 增加企业识别和解释入射信息的困难, 使母公司误解甚至没有感知到来自子公司的顾客偏好信息或者新技术机会。文化环境差异会导致知识价值损失, 在知识利用过程中增加时间损耗。文化距离腐蚀了企业现有资源基础的有用性, 导致企业早期积累的经验资源无法应用于本地知识吸收过程。文化距离会阻碍人际互动, 使沟通变得更困难, 使企业机构、系统和过程需要重新调试。文化距离会增加技能和资源配置的因果模糊性以及知识粘性, 对知识转移效率具有负向影响<sup>[21]</sup>。文化距离导致适应成本、绩效监控、子公司间冲突处理、信息共享、战略资源转移等成本增加。文化距离增加意味着对专业管理服务需求增加, 需要对企业组织结构和决策惯例重新校对, 导致企业动态适应成本增加。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 企业受限于组织能力, 不能吸收新信息并将其应用于商业实践, 制约了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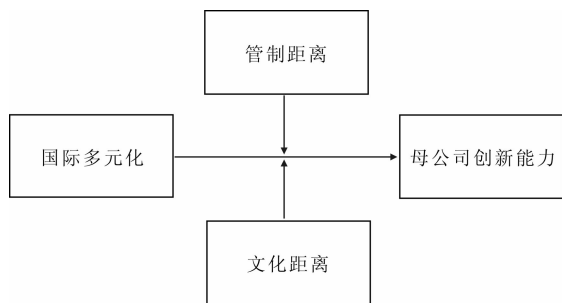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多元化、制度距离与母公司创新能力关系

尽管文化距离在国际商务研究中被实证检验, 但它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的作用仍然处于探讨中。文化距离是一柄双刃剑<sup>[22]</sup>, 既有分裂效应又有协同效应。文化距离为企业带来了更丰富的知识资源和更广阔的文化视角, 有利于企业打破原有惯例和刚性, 提升整合潜力<sup>[23]</sup>。文化距离的多样性能够产生新的商业实践, 有利于探索新资源。文化距离是互补性的来源, 有利于提升创造力。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 国际化企业能在差异中捕捉创意, 寻求价值创造机会,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因此, 提出如下对立性假设:

假设 3a: 当文化距离增加时, 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会减弱;

假设 3b: 当文化距离增加时, 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会增强。

## 3 研究设计

###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作为研究对象, 依据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年), 选取医药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等 6 大类共 420 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其中并未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企业和仅在避税地(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设立分支机构的企业, 最终形成 136 个有效样本 3 期(2010—2012年)数据值, 共计 408 条数据。

企业国际多元化数据来自两个渠道, 以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库为主, 以企业年报为辅。专利数据和技术多样性数据来源于 Soopat 专利搜索引擎, 管制距离数据来源于世界遗产基金会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 文化距离测量所需数据源于 Globe Project, 企业研发强度数据来源于 CCER 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行业研发强度数据来源于 EPS 全球统计数据平台。

### 3.2 变量测量

因变量: 母公司创新能力。专利数据是测量创新能力的常用代理变量, 本文用企业当年新申请的专利数进行衡量。

自变量: 国际多元化。本文采用截至当期企业海外分机构的数量衡量国际多元化程度, 该指标代表了国际多元化的重要特征。

控制变量: 企业获得的专利数受到行业或者企业自身特征的影响。①控制了行业因素的影响, 针对高技术企业特点, 采用行业研发强度作为控制变量; ②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变量: a 企业年龄。采用企业从注册到当期的时间跨度衡量; b 企业规模。参照 Zahra 和 Hayton 的研究, 用员工数量代表企业规模; c 企业研发强度。采用研发费用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d 技术多样性。采用布劳指数进行测量, 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  $P$  代表企业在第  $i$  个技术领域的创新行为所占比例。

$$T = 1 - \sum_{i=1}^n p_i^2 \quad (1)$$

调节变量: ①管制距离。采用经济自由指数测量管制距离, 具体指标包括商业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劳动自由和财产权, 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其中,  $r$  代表各个国家经济自由指数得分;

$$RD = |r_{china} - r_{host}| \quad (2)$$

②文化距离。采用 Globe Project 数据进行测量, 包括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组间集体主义、绩效导

向等 9 个项目,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其中,  $i$  代表文化距离各维度得分,  $v$  代表各维度方差。

$$CD = \sqrt{\sum_{i=1}^9 \frac{(i_{china} - i_{houst})^2}{V_i}} \quad (3)$$

上述涉及的距离是指两国间的管制距离和文化距离。样本企业在多个国家拥有子公司,因此,每个企业的制度距离是涉及多个国家的复合距离。以管制距离为例,复合管制距离计算公式为:

$$RD_{cross} = \sum_{L=1}^n RD_L * \frac{S'}{S} \quad (4)$$

式(4)中,  $L$  代表东道国数量,  $S$  代表子公司总数,  $S'$  代表跨国企业在第  $L$  个东道国的子公司数目,文化距离可按照此方法计算。

### 3.3 模型建立

为了从实证角度检验国际多元化、制度距离与母公司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基于企业层面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INN = f(IDV + TD + ERI + IRI + AG + SI + ID + IDV * ID)$$

其中,  $INN$  代表创新能力,  $IDV$  代表国际多元化,  $TD$  代表企业技术多样性,  $ERI$  代表企业研发水平,  $IRI$

代表行业研发水平,  $AG$  代表企业年龄,  $SI$  代表企业规模,  $ID$  代表制度距离。

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专利申请数,是一个计数数据。因此,本文采用计数模型<sup>[24]</sup>。本文样本方差不满足与均值相等的假设,出现了数据过度分散的现象(标准差=405.147,均值=76.86029),采用改进的泊松回归方法,即负二项回归<sup>[25]</sup>,并通过 Stata12.0 软件实现。由于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方式,未采用 OLS 回归方法,因此,对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的考察不需要作过多考虑<sup>[26]</sup>。在回归分析过程中,进行 Hausman 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

## 4 实证结果

### 4.1 样本企业特征

如表 1 所示,样本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年龄主要分布在 5~20 年,此阶段的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资源积累和吸收能力,可通过国际多元化推动技术创新。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类企业占比最大,仪器仪表制造类企业较少;从所在地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广东、北京、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

表 1 样本企业特征描述

企业规模分布		企业年龄分布		行业分布		所在地分布	
员工人数	占比(%)	年龄	占比(%)	类别	占比(%)	省份	占比(%)
0~2 000	51.8	0~5	2.9	医药制造	16.8	广东	38.8
2 000~4 000	22.0	5~10	32.4	电子通信设备制造	58.5	北京	17.6
4 000~6 000	12.3	10~15	34.5	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	21.0	浙江	13.2
6 000~8 000	4.4	15~20	25.3	仪器仪表制造	3.7	江苏	6.6
8 000~10 000	2.5	其它	7.8			山东	5.9
其它	7.5					上海	5.1
						其它	12.5

### 4.2 回归结果

表 2 给出了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矩阵。表 3 展示了创新能力的负二项回归模型。模型 1 加入了控制变

量,模型 2 加入了自变量,模型 3~4 分别加入了两个调节变量。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1~4 均符合随机效应模型。

表 2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产业研发强度	1								
企业规模	0.052	1							
企业年龄	0.093	0.364**	1						
技术多样性	0.035	0.069	0.122*	1					
企业研发强度	-0.067	0.042	-0.13**	-0.029	1				
国际多元化	-0.047	0.280**	0.068	-0.003	0.049	1			
管制距离	-0.020	0.269**	0.057	0.079	0.155**	0.087	1		
文化距离	-0.028	0.328**	0.156**	0.124*	0.152**	0.169**	0.870**	1	
母公司创新能力	-0.054	0.239**	0.074	0.038	0.046	0.881**	0.081	0.014	1
均值	1.521	7.616	13.32	0.349	6.511	1.780	0.986	26.930	76.861
标准差	0.0916	1.160	5.382	0.240	6.751	6.753	0.750	20.065	405.147

注: \*、\*\* 分别代表在 5% 和 1% (双侧) 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 1 表明,企业技术多样性和研发强度系数分别在 0.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多样性和研发能力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此结果与 Lahiri 的结论相一致。模型 2 表明,国际多元化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国际多元化对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 1。模型 3 表明,国际多元化与管制距离的交叉乘积项系数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管制距离对国际多元化和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 2。模型 4 表明,国际多元化与文化距离的交叉乘积项系数在 0.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文化距离对国际多元化和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 3b,拒绝了假设 3a。

##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中国高技术企业为样本,从国际二元性视角,探讨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多元化、制度距离以及母公司创新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国际多元化对

母公司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验证了 Luo 等人提出的“跳板”效应。该结果与 Frenz 等人的结论一致;②管制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创新能力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该结果与国际商务中关于制度差异的研究一致,管制距离成为新兴市场企业国际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③文化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与创新能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该结果与 Chao 等人的结论一致。新兴市场企业能够利用多个市场和不同文化视角接触多样化知识,通过国际扩张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各维度在企业国际多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应该加以区分。

本文的理论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了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研究。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的起点、模式、路径都是独特的,其国际化过程更为复杂。本文从二元性视角探讨了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多元化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指出企业在海外的知识利用和知识寻求能够提升母公司创新能力,从新视角解释了国际多元化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表 3 创新能力的负二项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随机	模型 2 随机	模型 3 随机	模型 4 随机
常数	0.140 506 9	0.100 416	0.170 121 1	0.196 047 5
产业研发强度	-0.235 423 9	-0.229 396 7	-0.233 022 9	-0.244 412
企业规模	0.013 583	-0.000 032 6	-0.005 278 8	0.004 328
企业年龄	0.006 344 3	0.007 628	0.002 079 4	0.004 353 9
技术多样性	2.708 491***	2.709 121***	2.714 695***	2.681 453***
企业研发强度	0.016 100 6*	0.016 016*	0.017 425 1*	0.015 960 5*
国际多元化		0.016 234 8*	0.344 801 8***	0.274 947 2***
管制距离			0.003 279 8	
文化距离				0.083 841 7
国际多元化 * 管制距离			-0.010 982***	
国际多元化 * 文化距离				0.223 097 2***
N	408	408	408	408
Groups	136	136	136	136
Hausman chi2	6.55	12.46	11.20	10.51
Hausman p	0.256 0	0.052 5	0.190 6	0.230 8
Log likelihood	-1 609.962 3	-1 608.224 9	-1 604.229 1	-1 602.449 5
Wald chi2	166.67***	171.05***	183.95***	198.32***

注: \*、\*\*、\*\*\* 分别代表在 5%、1% 和 0.1% 的显著水平(双侧)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2)深化了制度距离研究。管制距离增加了企业识别、分析和解释东道国市场信息的难度,影响了知识获取和转移,弱化了企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文化距离是互补性的来源,文化多样性能够产生新的商业实践,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能够进一步增强国际多元化对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本文通过对管制距离和文化距离的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制度距离不同维度的作用,深化了对制度距离的认识。

本文的启示作用:①具有较强能力的新兴市场企业不应该完全依赖于内部研发,可以尝试通过国际扩张作为获取研发资源和提升技术能力的方式;②“走出去”的企业应该致力于提升企业知识转移和吸收能力,将新知识整合、转化为母公司的创新能力;③经理人需

要研究企业潜在东道国的管制环境,控制管制距离在国际多元化中的制约作用;④研发人员在面临文化上相距较远的顾客需求或者规范、程序和惯例时,不仅应意识到文化冲突,还应意识到这可能是企业创新的机会。

本文的局限在于:①样本选择局限。本文以高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库进一步筛选,最终获取的企业数量有限,导致样本截面数据偏少,后续研究应该结合多种数据库或者问卷调查,增加截面数据;②变量测量的局限。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和新兴经济体国际扩张的特征,本文采用海外分支机构的数量来测量企业国际多元化。事实上,国际多元化内涵丰富,不仅包括规模和范围维度,

还涉及不同子公司在不同国家的行为复杂性。后续研究应该考虑国际多元化的复杂性,在变量测量上进一步加以完善。

#### 参考文献:

- [1] DI MININ A, ZHANG J, GAMMELTOFT P.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R&D in Europe: a new model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30(3): 189-203.
- [2] 陈永广,韩伯棠,李燕.基于知识流动视角的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国外研究述评[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16):156-160.
- [3] FRENZ M, IETTO-GILLIES G. Th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knowledge: evidence from the UK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7): 1125-1135.
- [4] JEONG I.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03, 20(4): 353-376.
- [5] YAMAKAWA Y, PENG M W, DEEDS D L. What drives new ventures to internationalize from emerging to developed economi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 32(1): 59-82.
- [6] CHAO M C H, KUMAR V.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diversity-performance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1): 93-103.
- [7] HITT M, IRELAND R D, HOSKISSON R. Strategic management cases: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M]. New York: Cengage Learning, 2012.
- [8] TSAO S M, CHEN G Z.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3): 617-642.
- [9] SCHWEIZER R, VAHLNE J E, JOHANSON J.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an entrepreneurial proces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0, 8(4): 343-370.
- [10] AL-LAHAM A, AMBURGEY T L. Knowledge sourcing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arget profiles[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5(45):247-275.
- [11] RAISCH S, BIRKINSHAW J, PROBST G, ET AL.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balancing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for sustained performa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4): 685-695.
- [12] HSU C W, LIEN Y C, CHEN H. International ambidexter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small emerging economies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3, 48(1): 58-67.
- [13] DENG Z.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J].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2012, 11(1): 31-55.
- [14] CHEN V Z, LI J, SHAPIRO D M. International reverse spillover effects on parent firms: evidences from emerging-market MNEs in developed market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2,30(3):204-218.
- [15] GAUR A S, LU J W. Ownership strategies and survival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impacts o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experie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33(1): 84-110.
- [16] JENSEN R, SZULANSKI G. Stickiness and the adap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in cross-border knowledge transf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6): 508-523.
- [17] XU D, SHENKAR O. Not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4): 608-618.
- [18] DE CLERCQ D, DANIS W M, DAKHLI M.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contex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sociational activity and new business activity in emerging economie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0,19(1):85-101.
- [19] WU J. Divers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3,50(4):1-21.
- [20] WANG H, SCHAAN J L. How much distance do we need? revisit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paradox”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8, 48(3): 263-278.
- [21] QIN C, RAMBURUTH P, WANG Y. Cultural distance and subsidiary roles in knowledge transfer in MNCs in China[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2008,2(4):260-280.
- [22] REUS T H, LAMONT B T.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cultur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8):1298-1316.
- [23] LARSSON R, FINKELSTEIN S. Integrating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and human resource perspectives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 case survey of synergy realization [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9,10(1):1-26.
- [24] 魏江,应瑛,刘洋.研发活动地理分散性,技术多样性与创新能力[J].*科学学研究*,2013,31(5):772-779.
- [25] 赵炎,郭霞婉.结构洞度对联盟网络中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企业联盟网络[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9(17):76-81.
- [26] 赛伟.中国企业国际扩张与创新能力:母国产品开发经验的调节作用[D].杭州:浙江大学,2013.

(责任编辑:张悦)